

考究的母亲

文/邹永东

都说母子连心,然而端详着母亲满布皱纹的脸庞,忽然间生出一种陌生的感觉,让我惴惴不安。而更令我不安的,是她邋遢的衣着和随之而来对垃圾的热爱。

我先前认识的母亲,饭菜做得马虎,但对家人的照顾还算悉心,四时八节祭祀礼仪以及一些小细节却不从不含糊。在一帮亲戚看来,母亲是个十分考究的人。

每年的清明、七月半,遇到祭祖的日子,对我们都是一场考验。中午放学回家,饭菜盛上来,母亲让我们先上香,待磕完头,烧完纸,母亲还不让我们吃,因为祭祖的饭菜不能让人吃,需重新下锅热一下,才能进食。当我们匆匆扒了几口饭,也快到了上学的时间。

印象中,年夜饭在家中更是头等大事,整个过程,母亲有着严格的时间表,也是绝对的主角。指挥着我们淘米、洗菜、剥皮蛋、切香肠、盛饭菜,待我们酒足饭饱,母亲也渐入佳境,命令还陶醉在春晚中的我们迅速打扫“战场”,并在第一时间,将烧好的开水端上桌子。此时的母亲一脸严肃,仪式般地将糯米粉一勺勺舀入脸盆,兑入开水,热气腾腾地和起面来。花生酱、芝麻酱、赤豆沙都已整装待发,听从母亲的命令,依次进入糯米圆子里。看着桌面铺满白白胖胖的圆子后,母亲才长出一口气。稍事休息,母亲一鼓作气地排出香案,摆上供品,点上香烛,让我们依次磕头接天地,当周围的爆竹声排山倒海般响起之时,母亲拿出一个大篮子,让我们先在院子里点燃一板子鞭,再将“天地响”挨个排好,一一点爆。这些当然是我和哥哥的事,姐姐此时已钻进被子只有听的份了。

从大年初一,直到初五,母亲便收起家里的刀剪,甚至连父亲动一下笤帚,也要大动肝火。

撇开过年期间事无巨细的考究,母亲让我最开心的,便是让我们可以尽情炸炮仗,特别是当我上初中后,单手拿着一枚“天地响”,看着它点燃后,从拇指和食指间轰然升起,空中开花,闻着满是硫磺味的手指,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硝烟散尽,母亲已然苍老。

很多时候,母亲对我们很是严厉,打碎个水瓶小碗之类的,要数落个半天,但也有让我感动的时候。幼时,常有个感冒发烧,被母亲领着去打青霉素,一针下去,好半天缓不过来。就在那一个冬夜,大脑昏沉,屁股酸

疼,打完针回家,母亲笑着向我招招手,转到床帷的后面,打开大衣箱,从箱里掏出一只红彤彤的“国光”大苹果,我还没接过那果子,闻着那香味,病痛便好了大半,来不及清洗,一口咬下去,说不出的舒坦。还没吃上几口,就被母亲拿回去,仔细包好收回箱子。可惜的是,即使物质丰富的今天,也再没吃到过那滋味。那时,在我心里,母亲简直就是神话故事里掌管圣果的仙女。

如今的母亲再也没了仙女的神韵,很多人和事也记不起来了。但有一天,我开车接父母到我家洗澡,从东吴路经过北固山时,母亲突然对我说:“你那时还抱在手上,晚上把你从父亲工厂的托儿所里接回来,为抄近路,便走了烈士陵园边上的小路,你手里的馒头没拿稳,掉到了地上,便把你放下,回头去捡,之后你便一路哭个不停,到家后竟哭得抽了起来。听人说,可能在路上遇到了脏东西,依照指点,连着敲三次床沿,边敲边喊你名字,总算把你喊家来了,要不然真的很危险呢。”

我还想听我小时候的其他故事,可惜她总是岔到其他的话题,我只有悻悻而走。

到父母居住的老屋,难得一见新鲜的食物。惦着他们,妻子打好豆浆,总是叮嘱我送点给他们。当我拎着豆浆和包子,出现在父母面前时,母亲总会说:又让你们花时间花钱了,真是难为你们了。

当我又一次走入那熟悉的巷口,远远地看到,一个头发花白、蹒跚而行、衣服破旧的老妪正凑近垃圾桶。仔细一看,我的双眼顿时模糊了,那不正是我的母亲吗?尽管努力地控制着情绪,但脱口而出的,却是令我自己都感到震撼的一声巨吼:你在干什么,这是垃圾啊!看着我凶神恶煞般的模样,母亲嗫嚅道:这些东西扔了真可惜,要送给老邻居的……我不敢相信,这就是我那先前考究的母亲,更不敢相信,对母亲吼叫的竟是自己。将母亲拽回家中,腿脚打着颤,拄着拐杖的父亲,在一边嘟囔着:她可是你妈妈啊,你不要这样对她……

带着母亲到医院,通过检查,医生给出的结论,母亲是患了阿尔茨海默症,也就是老年痴呆症。

看着母亲被风吹乱的白发,我劝慰自己:人总是会老的。同时也有更多的自责,以前对父母太不关心。现在该轮到我来照应他们了。

油墨飘香沁我心

文/鲍明成

又是一年开学季,近日,我去学校拜访一位老师,来到打印室,这位老师正忙着打印各种表格、报表和《告家长们的一封信》……没过多少时间,几千份打印好的资料便呈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拿起一份刚刚打印好的资料,闻了闻,哇!真香!我不由回忆起当年的一幕幕情景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跨进了小学。三间平房,两间做教室,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。一至三年级的小朋友坐在同一个教室,由一位老师轮流给三个年级上课,这是当时特有的复式教学。那时的教学条件极差,坐的板凳、搞卫生的笤帚和簸箕都得学生从家里带到学校来。我们花几分钱买来一张大大的白纸,用剪刀裁开,再让奶奶或妈妈用线订成册。练习和考试的时候,老师把题目用粉笔抄在黑板上,我们得先把黑板上老师出的

题目抄下来才能做。

我上四年级时转学到侯庄小学就读。小学快要毕业时,学校有了一台老式油印机,虽然如此,但考虑到油墨要花钱去购买,平时学生各门功课的练习还是得手抄或使用印蓝纸,只有期末大考时,学校才会用油墨去印卷子。

那时,老师们把试卷出在一张8开的白纸上,刻到蜡纸上,再把蜡纸平铺在油墨箱里,用刷子在上面左右、上下刷个遍,一张试卷就印好了。这样的卷子要一张张刷,速度实在是很慢。后来有了圆滚筒,滚筒上蘸上油墨,一页页印,试卷印起来就快多了。有时候,考的年级、科目比较多,工作量很大,几乎全校老师都要上阵,经常弄得手上、脸上都是油墨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我当上了一名代课教师。我清楚地记得,每到期末考试或小

学毕业考试前,我和教平行班语文的老师每天都要先在白纸上出好试卷,再到蜡纸上刻试卷。弄得手上、脸上、衣服上全是油墨,忙到晚上十一二点都是常事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,我还和教平行班的语文老师分工合作,我出卷,他刻钢板,然后一起去印刷。那时学校里有位姓丁的老教师,刻钢板的功夫一流,既快又好,我们经常请他帮忙,可亲可敬的丁老师从不推辞,帮我们刻了一张又一张试卷。如今他已离我们远去,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未忘。

如今,教学条件和过去比已是天壤之别。复印和打印试卷是分分钟的事。纸质试卷的变化是伟大祖国日新月异、突飞猛进的一个小小缩影,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,人们奔向小康生活在教育行业上的一个具体体现。

外公输了

文/程兆春

一场羽毛球赛,在外公和外孙女之间展开,作为外公的我输了,输得很惨,一败涂地,是脸面扫尽,无地自容,成者为王,败者为寇。

暑假中,外孙女常去羽毛球馆训练,她在江山名洲社区球馆,已接受训练有两年了。进步很快,可与其他的小朋友PK,一窝之鸟,球技却高于他们,有悟性,灵气十足,常立于不败之地。

与羽毛球结缘已是几十年前的事。高中毕业后,分配进工厂。那时厂里的年轻人很多,老牌大学生,技术员曹一湖,福建人,比较喜欢打羽毛球。福建为羽毛球之乡,从小接触羽毛球,自然他成为厂里的头号羽毛球种子选手,在他的影响之下,我也重新拿起了羽毛球球拍,时常和他打羽毛球,近朱者赤,慢慢的便成了厂里羽毛球的二号选手,在厂八年,打了羽毛球八年。

这都是过去的事了,和羽毛球也久违了多年,一切都淡化了。那天女儿说,老爸会打羽毛球吗?那当然,不是吹的,年轻时,我的羽毛球球技挺不错的,参加市里比赛还获过奖。那你的外孙女,比比看,看谁能打赢谁。

于是乎,和外孙女的羽毛

球之战即将打响。换上早搁不穿的6号球衣、短裤,踌躇满志,信心倍增。

11岁的小毛孩,就凭老底子,三指抓螺蛳,我也是稳胜,赢球在握。

我们三代人,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江山名洲的羽毛球馆。球馆的环境很好,是很正规的球场。锃亮的木地板,黑铁柱杆,白尼龙绳的球网,整齐划一的白色的场线。

手握1000多元的铂金钢的球拍,轻而上手,比昔日的木球拍不知好上多少倍。三局两胜,哨声起,一老一小的比赛正式开始。

不打不知道,一打便感到对手的技术不凡,左撇子的她,发球刁钻,扣杀凶猛,滑步灵活,远球,近网球,接球有术,得心应手,球的落点,恰到好处,是越战越勇,越打越顺手。眼前的对手,哪像11岁的小女孩,难以招架。

几个回合,便有点力不从心了,大有技艺不如人的感觉,那几十年前的老底子,薄如纸片,哪能和正规训练,练而有术的人比啊。三下五除二,很快就输了第一局,而后是王小二过年,一年不如一年,直接跟不上趟。



而外孙女是轻松的连胜三局,自古英雄出少年,老朽输得心服口服。此时的我可谓大汗淋漓,气喘吁吁,有点无力了。而小外孙女,神情自然,仿佛刚刚的比赛没有发生过,喝着龙泉牌的矿泉水,也无胜利的骄傲,只是心中默默地念叨,外公你老了,不行了,服老吧。

拳不离手,曲不离口,这场赛事后,由于多年疏于打羽毛球,打羽毛球的消耗也大,费心费力,也谈不上往年的羽毛球技艺了,有些腰酸背痛,好几天后才慢慢地恢复,缓过劲来。通过这场比赛方才知,青春已过,老了,力不从心了。尽管平时也注意锻炼,还是不能和过去同日而语,难怪激烈的羽毛球赛事。

这场羽毛球赛,外公败了,输了个彻彻底底。而心中涌起的是期盼孩子能够加倍的努力,乘势而上,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,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。